

---

# 一本值得中日两国读者阅读的好书

## ——《卢沟桥事变史论》评介

李良志

---

每年的7-8月,都是中日两国史学界——近些年也成为政府间话题集中而且敏感的月份。7月有一个“七七事变”,是6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子。“八一五”则是日本战败投降的纪念日。日本国地处日本列岛上,跨海来华,发动战争,杀人掠地,最后战败投降,其侵略行径,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其国内一些右翼势力纷纷活动,企图翻历史旧案,竟然否定东京审判,否认侵略,推卸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于是不断发生教科书事件、阁僚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阁僚因发表否认侵略言论引起国际抗议而被免职的事件,等等。他们否认侵略所使用的主要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力图否认战争的起始——卢沟桥事变是日军有计划挑起的。他们伪造许多荒唐无稽的“史料”,发表许多强词夺理的言论,挖空心思地要把铁和血写成的历史翻个个。卢沟桥事变不仅不是日本挑起的,相反,倒是中国挑起的,日本只是“被迫应战”。近些年,他们更把谣言造到中国共产党身上,诬蔑中国共产党用“谋略”挑起“晋中之战”,日本也是“受害者”。这些伪造的“史料”和虚假的言论以及这些言论所表现的军国主义思想的泛滥,已经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仅不利于中日两国正视自己本国的历史,而且更有害于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中国史学家有责任澄清被日本某些史学家搅乱了的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曲家源是中国历史学者中多年来从事卢沟桥事变史研究并取

得突出成绩的一位。1991年,他的《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曾作为中国华侨出版社“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出版。该书着重批驳了日本近些年来形形色色有关“中国挑起卢沟桥事变”的奇谈怪论,对于扼止日本的胡编“史料”,消除混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最近,他又与白照芹合作出版了《卢沟桥事变史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以下简称《史论》),把卢沟桥事变放在30年代日本世界战略的总体背景下来研究,对卢沟桥事变的全过程作了完整明晰地论述。其中尤以对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为研究重轴,深刻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激励和推动卢沟桥抗战中的伟大历史作用,全面探讨了卢沟桥抗战在中共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 and 意义,以确凿的史料和严密的推论考证了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的信息来源、论断依据和电文发出的时间,考证了中共北方局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工作状况,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这一重要的党史文献理清了头绪,从而使那些日本右翼分子的诬蔑谣言不攻自破。

《史论》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所有论点都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之上,引证史料详实赅洽,在史料排比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它所引用的史料没有道听途说,没有捕风捉影,都是原始的文献或经过考证经得起检验的当事人回忆录,其中包括许多日本方面的资料。这样就使它的结论自然可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是中国现代史微观研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过去人们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以为只有研究古代史才需要考据,而现代史似乎可一目了然,只要进行定性分析就可以了。实则不然。例如卢沟桥事变,由于它关系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主要是日本当事人的负罪感,所以他们极力要推卸罪责),而且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形象,一些不能正视历史的日本人就千方百计地想要歪曲它的本来面貌,这项考证工作因之显得特别重要而又相当复杂。《史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原来已被日本一些史学家弄得是非颠倒、真假难辨、混乱不

堪的卢沟桥事变史,在这本书中都得到了条分缕析的澄清。一个个问题都被解决了。日本一些史学家不敢公开否认“侵略中国”,他们变换手法,用所谓“实证研究”企图在具体事件上得出“责任不在日方”的结论。《史论》则用历史事实把它们所谓的“实证”一个个证伪,揭破其弄虚作假、狡诈欺世的真面目。正反双方资料的充分运用,不仅在于批驳谬误,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透彻的正面论证。这就使其结论更加真实有力。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问题,在中国海峡两岸,看法都是一致的。它是当年驻华北日军侵华“谋略”的产物。对这一点,没有疑问,也没有争论。但在日本,这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论题。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它已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而极力要跻身于世界政治大国之列,因此把改变历史形象看得特别重要。这就是他们批判所谓“自虐”史观的社会心理动因。日本一些严正的史学家,他们治学谨严,在卢沟桥事变研究中,对一些具体过程、事件细节,能够力排众议,揭露伪造,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论断,但在总的结论上,他们往往仍跳不出日本大的政治气氛,依然把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归结为“偶发”。《史论》在涉及这些史学家时,既高度评价他们的积极研究成果,同时对他们的错误观点也进行直率的批评。《史论》在这方面的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第二个显著的特点。例如日本爱知大学江口圭一教授,1988年他出版专著《卢沟桥事件》,在排除所谓“第一枪”系现场中日两军以外的第三者所放的各种推测、关于现场日军第八中队长战后发表的《笔记·书信》是伪造的等方面的考证,对日本的卢沟桥事变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但江口教授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的。他的依据是:“1937年7月7日到8日,在卢沟桥发生的事件,并不是由于事前的计划和预谋而发生的。清水大尉指挥的第八中队并不是以挑起事件为目的而去进行夜间演习。由于第三者的预谋而挑起的余地也不存在。在这一点上,与由于关东军参谋的计划预谋而发起的柳条湖事件不同,可以断定卢沟桥事件是偶发的

事件。”这段话作为论证,关键的一句是清水大尉的第八中队是否“以挑起事件为目的而去进行夜间演习”。《史论》针锋相对地说:“我们认为,1937年7月7日晚清水节郎率日军第八中队到卢沟桥北侧演习,与此前的夜间演习不同,肯定负有特殊使命。”根据就是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在1938年7月在日本朝日新闻社举行的“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木说:7月7日是日军前半年军事操练的最后一天,7月10日要举行“驻屯军”的检阅。《史论》分析道:“7月7日夜是日军阴谋分子可以施展‘谋略’又不露马脚的绝好日期……江口教授看问题的角度不对。选择第八中队可能是偶发的,但选择‘7月7日夜’却是日军‘谋略’中的有意安排,是早已计划好的。哪一个中队在这一晚去卢沟桥演习,这个中队就担负挑起事件的任务。”这种分析入情入理,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让人折服。此点,我们相信江口教授也会认真考虑的吧。

日本侵华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战争对现在的青年人来说,是遥远的、隔膜的。他们对那场民族灾难的认识,充其量也只是影视作品中那些浪漫的故事。1995年作家梁晓声发表一篇“与日本女记者的对话”的文章,谈到日本和中国一部分青年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曾引起许多人的震动。确实,谈论那场战争,不仅仅是占地多少、杀人多少、掠夺多少、给中国造成的财富损失多少等等这些实际的灾难,这里更包涵着人类应有的尊严被践踏、正义被摧残、和平被破坏。中国人民正是为此而抗争、而奋斗,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现在,日本有些史学家仍然抱着旧军国主义的立场,做着为侵华战争推卸罪责的“实证研究”,他们牵涉的不仅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其中也包涵着浓重的民族情绪和历史偏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有必要让中国人知道。读《史论》,我感到其中洋溢着一种强烈的中华民族正气,一股敢于正视历史的民族自立自强之气,很值得青年人一读。有一个日本史学家抓住蒋介石说过的他对卢沟桥事变的处理是“不幸又不幸的错误”一句话,把日本侵华的责任推给中国承担,说:“这是日中双方的责任。蒋先生似乎过早下决

心抗战的最大因素，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行动所累积起来的对日不信任，这是无可否认的。”《使论》对此驳斥道：“我们不知道蒋介石说这番话的动机是什么。但可以肯定，把光荣的卢沟桥抗战说成是‘不幸又不幸的错误’，必然遭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以蒋的一句话就让中国承担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这不是历史研究，只能说是文字游戏。”这些话说的铿锵有力，大义凛然，发人深省，不仅中国读者读后感到肃然振奋，相信不带偏见的日本读者也能从中倾听到一种反抗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正义之声。因为日本也是一个曾经遭受长期军事占领的国家，对民族尊严的感受会与我们相同的。日本读者过去只读过日本一些史学家歪曲中国抗战历史的片面之辞。《卢沟桥事变史论》把那些史学家的言论排列出来予以有说服力的辩驳，从这一点来说，这本书应该也是为日本读者写的。让他们看到中国对那些历史问题所掌握的资料和持有的观点，请他们来评判其中的是非，这将有利于中日文化的交流，并进而推进中日两国的全面友好。

(作者李良志, 1928年生,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维木)